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含义理解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寿金杰, 陈文烈

(青海民族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民族地区的进路机理与中国式现代化并联式发展、追求生态文明、注重人的价值、追求质量型发展的转向逻辑相契合。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破解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的嵌入,要求摒弃西方模式、跳出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现代化、坚持全国一盘棋。中国式现代化从国家在场带来的保障、以人为本带来的市场需求、生态文明带来的效能释放、产业体系带来的发展空间、和平发展带来的开放空间,体现着破解发展问题的现实基础。因此,民族地区应从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结果公平,坚持空间正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用数字与低碳技术五方面破解发展问题。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地区;发展问题

中图分类号: D64;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10(2023)03-0070-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1]。民族地区集多区于一身^①,地理区位与社会环境阐释了民族地区的内涵和外延,是我国重要的生态资源富集区、民族文化特色区、资源要素供给区。新时期,民族地区^②经济社会发展亦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前期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叠加共振,为民族地区发展写下生动注脚,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旧是民族地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一场域中探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话题既具有一般性特征,更凸显其鲜明的中国式的特殊性。

一、研究的缘起: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偏差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异化

中国发展进入新征程后,民族地区既往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的后果日益凸显,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已经不能有效弥合顶层设计所指向的关键战略目标的呼应和民众趋势性发展需求上涨所带来的诸多领域提质增效的诉求。纵观学术界关于民族地区发展的研究,可将民族地区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表现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认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供给侧高质量发展不充分(徐国祥、张静昕,2022);二是认为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国土空间格局高质量发展不充分(徐江虹,2019;李俊杰、梁辉,2022);三是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民生事业发展不充分(郑长德、张玉荣,2021;周竞红,2021);四是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不平衡,绿色动能发展不充分(蔡绍洪、谷城等,2022)。针对上述问题症结,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具体措施与解决办法,多从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李建民、贾斌昌等,202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吕灿、李敬,2023)、强化文旅产业融合(赵嫚、王如忠,2022)、提升生态治理

收稿日期:2023-06-19

基金项目:2023年度青海民族大学重点项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视廊下青藏高原绿色发展使命与功能——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编号:No. ESDYJ03;2023年度青海民族大学硕博项目“共同富裕视角下青海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对策研究”,编号:No. 23XJX11;2023年度青海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认知偏狭性与反思”,编号:No. 65M2023068。

作者简介:寿金杰(1999-),男,安徽阜阳人,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2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宏观经济管理;

陈文烈(1972-),男,青海民和人,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经济、政府经济。

水平(周伍阳,2021)等谋求经济增长,推动地区发展。

但这样的研究尚有不足,在讨论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学者们多聚焦民族地区同中东部发达地区物质财富体量相衡量比较下的不平衡,往往忽视了经济增长与内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在讨论民族地区发展不充分问题上多聚焦于民族地区的发展空间小导致发展优势无法释放,往往忽视了承接发展优势背后的发展范式、道路及基础与支撑的充分研究。在发展目标上,现有的研究多数是将单向度增长视为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诉求,陷入“增长崇拜论”^[2]的发展陷阱,仅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绿色循环经济”“低碳”或“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新式发展理念转移到民族地区以谋求快速充分的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此类分析只从一个侧面看问题,没有从发展范式上综合考虑分析,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发展范式来承接民族地区发展优势。民族地区发展目前呈现一种异化态势,目的与手段相颠倒,主体与客体相对立,机制与规范相失衡^[3],进而表征出诸多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究其原因是既往主流经济学的追求实现效率最大化与经济高速增长为核心准则的价值判断在融入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受到排斥,需要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应用进行深入反思。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由于发展基础差且存在着广泛低效率的生产模式,导致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能力的模式化锁定^[4],因此主流经济学普遍视民族地区发展为低效率的典型表现。建国初期,受西方经济思想影响,国内经济学的主流思潮是提倡以快速工业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举实现经济飞跃,国家现代化。因此诱导了许多地区包括民族地区走上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追求经济体量的高增长。可是,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发展的成效不够理想,如今仍被冠以“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等称号,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凸显,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主流经济学仅将民族地区特有的异域文化、丰富资源、生态环境等作为经济增长函数中或轻或重的一个变量,窄化民族地区为单一线性的竞争单位,掩盖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所蕴含的“多功能性”与“多维价值属性”。因此,主流经济学在民族地区的实践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偏差,具体而言:

一是主流经济学对经济的复杂性认识程度不够,逻辑推理与计量实证倾向于数字之间联系的存在主义分析,摒除了对研究对象属性和本质的分析^[5],所寻求的既定规律多是为了契合架构在特殊

条件下生成的理论;二是主流经济学保留并片面发展了经济学工具理性而舍弃人文精神,崇尚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色彩日益浓厚,以自由竞争促成最高效率和最大增长的实现,这种对高效率和大增长的无限推崇使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正义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扎根;三是主流经济学激进性地谋求经济增长,忽略了自然资本、生态价值、环境资源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最大承载力,诱发了严重的生态失衡、生态赤字现象,部分地区陷入“资源诅咒”^[6]困境;四是主流经济学假设经济人是理性的,仅将利益最大化视为人类唯一理性行为,舍弃了人类的生态、文化、社会理性,削弱了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物本化倾向愈发明显。不可否认的是,既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观念,通过诱导民族地区嵌套入高速增长发展进程的实践践履达成了区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缩短了民族地区同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但是这场以发达地区为追赶目标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事实上,随着高质量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共同富裕等成为新时代中国建设主旋律,社会的发展使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用一个更加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重新审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公平正义、绿色和谐、人文发展和精神满足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函数的重要变量。

综上所述,现阶段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囿于主流经济学理论偏差,进而诱发发展异化,投射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进路基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基质不在于缺乏发展理念的落实,而在于把发展的意涵理解为线性的、单向度的物质和财力的增加。如此民族地区发展在单向度发展理论的裹挟下日益空洞化和边缘化,致使民族地区在现代化的数据性衡量与价值链创新链培育、再造进程中凸显发展悖论的困境^[7]。这就迫切需要在民族地区场域内截断传统单向增长发展的诉求延伸,突破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桎梏,诱导民族地区发展理论的创新,实现平衡与充分发展的链接共振。因此,找寻一条科学兼顾经济功能、人文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和福利功能的基本发展范式,充分架构并激活民族地区发展各项优势,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突出问题,是本研究的重要核心。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地区“两类发展问题”的辩证审思

关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记已经有重要论述：“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一定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科学路径和持久动力”^[8]，按照这一表述，“发展”就是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在逻辑线索。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源于发展也应在“发展”中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内核，在澄明资本逻辑裹挟下现代性得以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权现代化”和“背离人”的矛盾属性的基础上^[9]，统筹经济、人文、社会、生态、福利功能，驳斥了主流经济学在民族地区实践的扭曲，可以修正民族地区发展的异化。因此，民族地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下加以推进，其发展的进路机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向逻辑相契合，“两类发展问题”也主动呼应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的嵌入。

（一）现代化建设下民族地区发展进路机理的明晰

明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下民族地区发展的进路机理，为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地区破解“两类发展问题”的辩证关系作一个奠基性的认知。

第一，民族地区发展是经济小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向经济大省跨越的过程。2012年至2021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从5.85万亿元增长至11.79万亿元，年均增长8.1%，接近全国同期8.6%的增长率。但2021年民族地区经济总量最高的云南生产总值才2.7万亿元，仅处于全国第18位^①；同时，民族地区内部各省区经济差异也极大，青海、新疆经济总量不及云南八分之一。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期，这要求民族地区不仅要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有效提升。

第二，民族地区发展是西部内陆边疆省份走向对外开放前沿、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过程。随着我国开放格局深度重塑，民族地区对外联系日益紧密，正从发展末梢转向开放前沿。民族地区发展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的机枢。这要求民族地区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自身发展嵌入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域，走出契合西部内陆边疆省份开发开放的实践途径。

第三，民族地区发展是多民族聚集省份弘扬平等互助、增进共同富裕的过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7726.42万人，占地区总人口38.14%，其中广西、云南、新疆和贵州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千万，西藏和

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达到了87.85%和57.76%^①。这种多民族人口省份的属性使得民族地区在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践中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快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确保各民族共同向着希冀发展目标前进。

第四，民族地区发展是文化底蕴浓厚省份彰显独特人文魅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过程。民族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民俗风情和多姿多彩的民族艺术，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如，花儿、麦西热甫、农乐舞等思想传承类文化资源；阿尔泰山、楼兰古城、纳木措、布达拉宫等别具一格的旅游体验类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一大优势，必须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做好开发保护工作，增强文化自信。

第五，民族地区发展是“两屏三带”重要省份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民族地区既是资源富集区又是生态脆弱区，依据国务院公布的《国家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名录》，在436个县级行政区中，民族自治县（旗）就有328个，占总数的75%；涵盖了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四种类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把民族地区作为构建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点。可见，民族地区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凸显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诉求下任重道远。

第六，民族地区发展是现代化效能偏低省份探索民族特色、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过程。民族地区发展进路内含诸多风险隐患，既有地区内部淤积的风险，又有因其特殊性承载着外部冲击风险^[10]，具有高度风险叠加性特征，特别是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和“三股势力”侵扰威胁。民族地区独特的治理困境，复杂多变的省情，是发展过程中避之不及的问题，必须科学纾解，精准施策，全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风险，为民族地区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民族地区发展的进路机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向逻辑相契合

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化中开辟了中国式发展的内生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现代化的根本性范式转换^[11]，其转向逻辑与民族地区发展的进路机理相吻合。

一是从传统的经济、社会、生态的串联式发展转

向并联式发展。传统的西方现代化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时至今日用了三百多年时间,这种以串联式为特征的发展模式线性单一,耗时长久^[12]。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要统筹兼顾各领域发展,实现后来居上,以最短的时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成经济跨越、对外开放、共同富裕、文化自信等各类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要采取“并联式”发展过程,采取“四化”交错叠加发展。

二是从传统的经济增长转向追求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经济社会繁荣。传统的西方现代化的目标是全力促进经济增长,基本上不考虑经济增长的生态规模问题,理论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受制于地球生态系统极限的约束,因此经常引起经济增长与生态规模的严重冲突。中国式现代化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行动选择之一,秉承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集一体的价值取向。这高度契合民族地区生态脆弱的区域特性对生态保护的诉求理念,对于破解民族地区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大有裨益。

三是从强调物质财富的增值转向注重人的价值的发展。西方国家发展模式是以资本为中心,引发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人的价值在发展中逐渐被消磨殆尽。中国式现代化所规划的发展不只是体现在物质财富层面,还要求精神世界财富最大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化了人的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民族地区随着既往工业化进程中对财富的效用以及敏感程度逐渐递减,发展逐渐回归人本位,这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的转向相一致。

四是从粗放型的数量型发展转向追求关心公平正义、社会关系、民生福祉的质量型发展。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指标等数值的显著增长,虽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带来的生态与社会代价已不再契合当下发展要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驱动推动动力变革来培育新动能,这一转向强调公平正义的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民生福祉的改善,是一种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向,这与民族地区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展演逻辑呈现出互联互通的关系态势。

(三)“两类发展问题”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的嵌入

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破解逻辑,本身也需要一个将“平衡与充分”概念放置在分析的

中心视野之中的发展范式的嵌入。

一是必须摒弃西方模式才能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着深厚的国情省情的特殊性,不能一味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尽管西方发展模式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但最终发展会陷入难以持续的境地。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拨与超越,有助于把发展从既有大量的西方范式甚至是理论的“西方霸权”中解放出来^[13],破除“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观念,保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冷静,避免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更好地契合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机理。

二是必须跳出民族地区才能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历时性维度来看,建国以来,民族地区迎来了爆发式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从共时性维度上看,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环境、文化等因素,整体发展实力还处于全国落后梯队。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薄弱,必须借助外部力量“输血造势”,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恰恰是凝聚力量、“外部输血”的重要手段。因此,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民族地区只有坚持全面对内对外开放,跳出民族地区看发展,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机遇,才能实现均衡充分发展。

三是必须与全国同步现代化才能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国式现代化是涉及各领域、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概念。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实现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化,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不可或缺。这不仅需要在国家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对东西部区域的资源要素和市场结构进行横向调整与配置,还要培育并积蓄民族地区正向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只有当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与全国保持一致,经济社会发展轨迹与全国同频共振,才能使得国家在场发挥作用、内生力量充分滋生,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四是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才能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并联式叠加发展,映射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国一盘棋,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牵扯诸多领域的全局性、系统性问题,不是孤立割裂的,更是一蹴而就的。因此,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以一个更高的宏观视角,基于“两类发展问题”内在契合性的外在彰显,探赜二者于共通属性上的现实联结,依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逻辑理路,在全国一盘

棋的系统性发展中解决。

从上述讨论可见,把民族地区破解“两类发展问题”的进路机理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发展布局中加以推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规范含义下破解民族地区“两类发展问题”的基础证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理论内涵。就中国式现代化规范含义下破解民族地区“两类发展问题”而言,有着充分的现实基础,应对现实基础进行系统全面证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两类发展问题”确然破解的应然之道。

(一)回应“国家在场”,聚焦“两类发展问题”破解的内驱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体现着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想。民族地区自建国以来就是国家战略实施的核心区,在西部大开发、兴边富边、一带一路、对口支援和脱贫攻坚等战略中,民族地区始终处于前沿与核心的时空位置,国家力量早已深深嵌入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肌体中,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力量,通过国家在场可以为民族地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提供强大保障,具体体现在: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关心民族地区发展。近年来,一方面,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使西部民族地区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桥头堡”,民族地区参与全球化、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和战略定位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方面,党从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出发,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将民族地区列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性支撑。另一方面,党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出台了一揽子帮扶政策。除了涵盖整个民族地区的全局性重大举措,如西部大开发政策,还有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优惠政策,如扶持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的优惠政策,关于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等。

二是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强大动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举措,可以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新动力。自1996年正式启动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以来,有力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尤其在脱贫

攻坚事业中,这一机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东部9省份的东西扶贫协作(2015—2020年)和307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2013—2020年)向对口支援贫困地区累计投入资金和物资1432.6亿元,帮助引进资金1.2万亿元,干部与专技人才交流超13.1万人次,培训基层干部与专技人才超368.8万次^[14],有力地加快了民族地区发展步伐。

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时代民族地区群众通过共同团结奋斗,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关系、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现代生活理念、人际交往模式等形成了更加理性而又充满“中华民族一家亲”温情的思想观念。在民族地区发展及建设的一系列能够增进共同性的实践活动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可以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民族地区向前发展。

四是全面小康为民族地区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小康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节点目标,目的是使原本抽象的经济发展战略落实为与每个人利益攸关的具体目标,为后续发展目标推进夯实全局性基础。随着2020年底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中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实现了全面小康,民族地区发展基础更加扎实,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领域得到了优化与提升。

(二)回应“人本需求”,聚焦“两类发展问题”破解的引领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充分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这既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临的巨大优势,也是重大难题。从民族地区发展的角度看,意味着在资源环境条件约束下,通过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消弭。这一过程最为关键的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开发内生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进程,使民族地区具有坚韧的需求基本面。通过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借助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最终带动破解“两类发展问题”,具体而言:

一是我国具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民族地区破解“两类发展问题”提供了庞大的消费需求。2021年,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8.8%,大约是6.83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此外,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相当于欧盟、美国、日本的总和,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

等收入群体。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 2035 年,我国消费市场总规模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15]。超大规模市场内部较大的区域差距为各地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潜力、机遇、韧性和活力,尤其对落后地区而言这是可变现的后发优势。可见,民族地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完全可以借助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

二是我国居民消费质量的提质增效为民族地区破解“两类发展问题”开辟了庞大的新消费空间。当前国内消费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演进趋势:一方面传统模式下的趋同性消费逐步转变为个性化消费,根据《2022 年中国兴趣消费趋势洞察白皮书》显示,“90 后”“00 后”等一批新青年消费群体兴趣消费平均月支出占比为 27.6%,个性化消费将成为未来引领市场的主流消费潮流;另一方面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逐步提高,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44.2%,比 2013 年提高 4.5 个百分点^⑤。同时,在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中明确指出要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可见,在当前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消费提质增效将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与关键动力源。由此,民族地区所具备的自然资源、文化产品、健康养老、旅游休闲、体育运动等种类丰富的优质产业可以满足人民消费升级需求,将在全民消费结构迭代的浪潮中迎来快速发展。

(三) 回应“效能要求”,聚焦“两类发展问题”破解的生态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环境优化的关系。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禀赋强,在破解“两类发展问题”中有着坚实的生态基础和比较优势,将生态优势高效能释放,可以为破解“两类发展问题”提高强大生态助力。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推进为民族地区破解“两类发展问题”开辟了广阔的绿色消费需求。近年来,“双碳”战略引领绿色发展道路,绿色消费需求也在发生变化。2022 年,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重点领域消费绿色转型取得明显成效,绿色消费方式得到普遍推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到 2030 年,绿色消费方式成为公众自觉选择,

绿色消费制度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基本健全。未来我国绿色消费市场将加速成长,公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将逐步增加,生态产品的稀缺性会愈发明显,民族地区绿色生态产品的消费空间将是巨大的。

二是消费者追求产品品质的满意度为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架构了桥梁。由沃尔玛、京东、腾讯等零售商基于平台消费数据联合完成的《中国零售商超全渠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指出随着消费升级的推进,高品质商品越来越受追捧;以啤酒为例,2018 年 6 月,京东到家平台上的精酿啤酒销量同比增加 123%,沃尔玛超市进口啤酒销量同增加了 58.9%;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调查也显示,该群体消费时在意因素的排序第一的就是产品质量(82.2%)。民族地区良好的生态底色和文化底蕴赋予了域内产品发展的先天优势,产出了众多的质量上乘的产品,例如,青海省的牦牛、藏羊、冬虫夏草;云南的茶叶、野生菌、药材;西藏的雪莲、藏毯、青稞香米等。这些绿色有机、高原特色、健康安全的产品,能够契合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高追求与严要求。

三是国产品牌的日益崛起为民族地区创新生态文化资源,发展民族特色商品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的稳步推进,广大消费者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认同感不断增强,消费观念日趋理性成熟。根据《2022 国货市场发展报告:新媒介、新消费与新文化》,中国鞋服行业 TOP20 集团市占率中,国货品牌市场占有率从 2011 年的 6.3%增长至 2020 年的 8.8%,中国彩妆行业国货品牌份额由 2015 年的 18%提升至 2020 年的 25%。可见,民族地区完全可以利用具备地域特征的多元化的生态民族文化,文化赋能产品塑造,打造更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类型的国产品牌,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

(四) 回应“任务追求”,聚焦“两类发展问题”破解的支撑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新概念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新任务,更加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目标及其内涵。产业是一个地区发展的主引擎。民族地区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中立足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为破解“两类发展问题”提供产业支撑。

1. 服务业的庞大发展空间为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了可能

在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占 GDP 比重 70%左右,我国目前才刚跨过 50%,2022 年底发布的《扩大

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提出要积极发展服务消费,这为民族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带来机遇。具体表现为:

一是服务业增加值的持续增长为民族地区扩大服务业规模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2012至2021年间,国内服务业增加值从24.49万亿元增长至60.97万亿元,年均增长7.4%,分别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0.8和1.4个百分点。据《2020中国服务贸易行业发展研究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60%,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从民族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来看,2021年民族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分别为:内蒙古51.7%、云南50.4%、青海49.7%、广西50.7%、宁夏47.2%、西藏55.7%、贵州50.4%、新疆47.9%。可知,除西藏外其余省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低于53.3%的全国水平,发展服务业的市场潜力巨大,应发挥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吸纳人员就业的重要作用。

二是现代服务业的广阔发展前景为民族地区创新发展特色服务产业开辟了空间。(1)我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014年的2.75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06万亿元,年均增速5.0%。民族地区旅游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期,根据《中国少数民族事业发展报告(2019—2020)》,2019年民族地区旅游总收入为3.07万亿元,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46.3%,八省区旅游收入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其中,新疆增速达到40.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4倍,表明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迈进提速增效阶段。(2)随着文化强国建设稳步推进,我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2012至202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达到12.6%,占同期GDP的比重从3.48%上升到4.56%,但尚未成为支柱产业,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从文化产业区域营收情况来看,2021年东、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分别为90429亿元,17036亿元和10557亿元^⑥,西部12省市及自治区只占全国8.9%,其所涉及的民族8省区占比更少,表明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潜力巨大。(3)健康产业具有拉动内需增长和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功能,是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但我国的健康产业发展水平欠佳。据《2022中国健康产业白皮书》报告,2021年中国健康产业规模大约为10万亿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7%,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近年来,民族八省区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的规划与政策。比如,云南省在《“十

四五”健康服务业发展规划》要求2025年全省健康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以上。由此可见民族地区健康产业发展政策保障充足,市场潜力巨大。(4)我国体育产业自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后,从2015年的1.71万亿元扩大到2021年的3.1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7%,总规模和增加值的增速均高于同期GDP增速,接近美国的3%,表明发展势头良好。民族地区丰富的户外资源、多样的自然环境赋予了发展体育产业特殊“禀赋”,为登山探险、骑马射箭、越野挑战、冰雪运动、水上运动、耐力项目等体育活动提供了广阔应用场景。

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为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新经济创造了可能

从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再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一系列扶持政策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民族地区将迎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热潮。具体表现为: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为民族地区“变道超越”提供了契机。2021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3.4%,比2014年提高5.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2012年的9.4%、28%,提高到2021年的15.1%和32.4%^[16]。《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预示着我国未来15年将迎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翻番的快速增长。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具有矿产、生物、光热、风力等多样化的资源基础,因此,拥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优势,具备“换道超车”的能力。

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质量的迅速提升为民族地区在同一起跑线上抢抓市场机遇创造了可能。当前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结构优化提升,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力量。未来,随着国内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外技术代差也会迅速缩小。这迫切要求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质量要进一步提升,在更高层次上对标定位,参与竞争。民族地区地域广阔,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丰富应用

场景和广阔市场空间。

(五) 回应“时代诉求”，聚焦“两类发展问题”破解的开放力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沿边民族地区是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主要门户，是“一带一路”内接外联的重要区域。因此，民族地区将自身发展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会创造出巨大的国际发展空间。具体体现在：

一是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业贸易快速增长。2013至2021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由6.5万亿元增长至11.6万亿元，年均增长7.5%，高于同期整体货物贸易年均增速，占同期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由25%提升至29.7%^[17]。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业贸易的快速增长，给民族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2016年至2021年，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通道，途径民族地区的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1702列增长到15183列^[18]。中欧班列以其通达国家多、运量大、运价低、分段运输和运输时间短等独特优势，为民族地区转向开放高地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是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吸引外商投资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49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是自2011年来第一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也在优化。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4%和29%，大幅高于全国引资增速；从目的地看，中西部地区引资优势和市场潜力不断挖掘，平均增速超过东部约2.8个百分点^[19]。民族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关键枢纽和西部地区中坚力量，承担着消化外资的重要经济功能。民族地区可以利用外资培育、完善和发展对外经济开放体系，加速区域发展进程。

三是民族地区参与区域合作交流迎来新机遇。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在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接、政策相互协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文交流互动等方面形成利益联结纽带，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卫生、科技等领域展开了丰富多样的交流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可见，民族地区未来在“一带一路”区域交流合作上将迎来新机遇。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范呈现的深厚基础

架构是以破解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旨归的解释性框架，生动映射了中国式现代化规范含义下破解“两类发展问题”的现实可行性，既是民族地区导向发展平衡与充分价值“标的”的实然面向，又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种全新形态。

四、中国式现代化规范含义下民族地区“两类发展问题”的实践破解

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发展范式是新时代新征程下民族地区消解发展问题，消除前进痛点滞点的应然趋向。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效破解。

(一) 服务与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是民族地区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抉择，应在新发展格局中统筹解决“两类发展问题”。

第一是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民族地区既要坚持以区域发展整体战略为指导，积极融入国家经济体系建设，又要适应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禀赋类型的改变，努力构建新的经济支撑带。另一方面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沿边开放，进一步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补好融资渠道、物流运输、营商条件等“短板”，使民族地区共享国家发展红利。第二是发展飞地经济是民族地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选择。民族地区的主体功能以及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和人力资本禀赋决定了某些产业的发展面临着禁入约束或限制性约束^[21]。飞地经济能够通过跨地域的行政管理 and 经济开发，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地区间资源互补与协调发展，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提供支撑。第三是借助地区市场腹地广阔和市场潜力巨大优势，融入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支撑的新发展格局。民族地区有着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纵深，生产和消费两端的潜力尚未完全释放。一方面，可以凭借地区能源、矿产、生物、旅游、文化、劳动力等优势资源，进一步发展区域性特色工业；另一方面，顺应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偏好变化，将康养、游憩、文娱等新兴服务业作为民族地区重要的发展立足点。

(二) 坚持结果公平导向，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结果公平导向原则是对民族地区差异性与自主

性的尊重,不仅理论上契合民族地区具体实际,而且是矫正实践偏差及其负面影响的现实所需^[22],应在结果公平导向发展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国家应站在结果公平的战略高度,审视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各项政策,因地制宜出台相应新政策,包括完善生态价值实现机制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合理分配政策、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政策、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政策等,以强化实现民族地区充分发展的支撑能力,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普遍性方针政策与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短板问题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构建促进和推动西部地区结果公平的政策系统。其次,民族地区要多举措补短板、强弱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以破解地区间市场分割、资源分配不均难题为重点,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为各族群众创造更好发展机会;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求,多措并举突破原有的资本逻辑,促进资本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坚持空间正义治理,促进城乡共富共美和社会公平正义

空间正义核心要义在于社会空间及其资源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是解决差异性地理区域中社会问题的依据^[23]。民族地区应在空间正义治理基础上建立更加平衡的良性循环空间。

第一,依托国家空间整体规划,国家在场从政策层面来合理优化空间布局,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提高空间配置效率,改善空间功能品质,增强空间治理能力,完善空间政策的匹配程度与配置效率,确保民族地区能同中东部地区等空间主体有效参与到空间规划和决策中来,强化民族地区空间规划权和决策权的保障力度。第二,在未来国家区域发展全局中,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需要继续加大协作力度,充分整合各方资源,提高东西部合作与对口支援的效能,促进东西部协同发展新格局优化,不断重构区域间资源流动时空结构,深化经济社会多领域交互,最终使空间结构形态和财富分布趋向均衡。第三,民族地区要乘国家空间战略规划的东风,不断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弱项,缩小城乡差距,牢牢抓住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兴边富民等一系列重大机遇,在发展中找准定位,在政策叠加共振的推动

下,架起资源要素流动的“快速路”,更好地吸纳和承接优质资源,加快建立推动自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可持续发展的应然之义。民族地区应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下,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

首先,民族地区要突破传统产业演进的时空约束,打造区域核心竞争力。要辨清传统产业伴随的生态结果不公,避免逾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严防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结合地区优势来制定核心特色发展战略,建设一批现代高效特色农业、民族文化产业基地、高质量旅游集群等。其次,将生态环境作为稀缺要素和重要生产力,引导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的发展道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产品的确权、量化、评估等工作,切实摸清各类生态产品数量、质量等底数,协同推进经济增长和生态保育。最后,要实行更加合理的生态治理行动。优化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重要生态系统、重点区域的补偿力度,探索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方式;加强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控制、节能减排等关键约束性指标的管理,消除企业等社会主体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负外部性;构建多元法律关系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低碳技术,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含量

数字技术与低碳技术是未来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决定了一个地区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竞争力。民族地区应立足数字技术和低碳技术,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含量。

一是民族地区应紧扣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目标,科学深挖低碳转型潜力与加强产业数字化改造,提升内生发展动力,防止与发达地区拉大发展差距,保障发展的独特优势得到有效发挥;二是民族地区新能源资源丰富,应以建设清洁能源基地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区域能源结构转型,大力推动风电、光伏、氢能、天然气、生物质能源等新能源产业多元化发展,培育精准农业、智慧旅游等新业态,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新活力;三是立足低碳协同与数字协作,构建新的区域经济联系。依托“东数西算”工程,与东部地区通过加强数据要素流动带动更深层次跨区产

业与服务联动发展。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要载体,围绕数字产业协作,推进大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资源共享与交流合作,增强区域数字产业的集聚力与影响力,深化区域间经济联系;四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通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可数字化服务资源向民族地区流动;另一方面,通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让民族地区生态价值充分实现,通过相关交易平台销售碳汇等生态产品,提高收入水平。

结语

本文将民族地区的欠发达水平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与条件,试图探究的问题是民族地区的发展空间有哪些?又是什么因素在形塑或建构这种发展空间?从两次西部大开发以来的演进看,民族地区快速现代化进程拓展的发展空间是多层次、多维度、多领域的。回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对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我们亟须厘清这些问题:如何保证资源禀赋丰富但发展空间承载能力有限、发展基础不同但发展诉求相同的民族地区拥有自我正向增长的可行能力而不是简单依附式发展?对民族地区而言其所面临的政策目标怎样才能有限的发展空间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又能提升民生?高增长与谋发展如何有机耦合并不断拓展发展空间?这些都需要由实践给出答案。但是,不管如何界定与讨论,破解“两类发展问题”已是民族地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成为所有政策的底色,民族地区也在努力追赶发达地区,而这一过程却是以生态和社会代价为基础的。此间民族地区面临的问题不是发展理念的落实,而是把这一追赶的发展意涵简单理解为线性的、单向度的物的衡量。如此,民族地区破解“两类发展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物质生产性、资源增长性主导下的单向度发展诉求,确立以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为价值旨归的中国式现代化增长发展理念。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时代热点课题已经受到了诸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同民族地区发展结合做了许多的研究,积累了一批研究成果,呈现出新的学术动向。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此类研究仍较匮乏且普遍缺乏正确的研究向度与定位维度,虽然关注到了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与实践的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以民族地区实际为基础的发展需要和实践知识的重要性。民族地区不可避免又会陷入

事实不确定、价值观存在争议、决策风险高但十分迫切的策略性发展模式。因此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需要对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增长与发展的过程机制、民族地区不同于中东部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和“两类发展问题”的因果逻辑进行系统性分析。

注释:

-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
- ② 民族地区是指以少数民族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本文所述民族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省份。
- ③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来。
- ④ 数据来源:根据民族八省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计算而来。
- ⑤ 数据来源:根据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来。
- ⑥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告,2012年和2021年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陈玉斌.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现代性理论范式[J]. 社会主义研究,2022(02):17-23.
- [3] 杨建华. 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01):68-74.
- [4] 陈文烈,周明顺. “结构困境”到“内生聚合”: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2022(01):155-166.
- [5] 常庆欣,张旭. “批判实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J]. 经济纵横,2013(07):35-40.
- [6] 王丽艳,许敬轩,马光荣. 解码资源地区经济发展:机制演变及展望[J]. 经济学家,2021(09):109-118.
- [7] 陈文烈,查妍. 民族地区发展悖论的破解与发展要素的时代赋值[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9(06):114-125.
- [8]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9] 张庆伟,崔美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五个必由之路”内在关系的辩证审思[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6(01):113-121+144.
- [10] 青觉,岳清春.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J]. 青海民族研究,2021,32(03):51-57.
- [11] 熊治东.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和世界意蕴[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1):

- 1-12.
- [12] 邹一南.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时空特征与实践逻辑[J]. 理论视野, 2022(03):43-49.
- [13] 陈俊翔, 陈翠芳.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1(04):7-13.
- [14] 王禹瀚. 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成就、经验与价值[J]. 管理世界, 2022, 38(06):71-85.
- [15]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 2035年中国消费市场总量超欧美总和[EB/OL]. [2019-11-03].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9/11-03/8996993.shtml>.
- [16] 辛国斌. 我国新型工业化步伐显著加快[N]. 经济日报, 2022-6-15(02).
- [17] 辛文. “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N]. 消费日报, 2022-10-11(01).
- [18] 国家统计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EB/OL]. [2022-10-09]. http://www.stats.gov.cn/sj/sjjd/202302/t20230202_1896693.html.
- [19] 高凌云. 中国外资流入再创新高的原因及意义[J]. 人民论坛, 2022(09):68-71.
- [20] 习近平.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N]. 光明日报, 2021-11-20(01).
- [21] 郑长德, 张玉荣. 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08):69-77.
- [22] 夏杰长, 王鹏飞, 申始占. 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公平和效率视角[J]. 消费经济, 2022, 38(06):3-10.
- [23] 吴本健, 巩蓉蓉. 空间正义: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9(03):128-142.

Understanding the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Based on the Normative Meaning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OU Jin-jie, CHEN Wen-li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07,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Route mechanism of ethnic regions is in line with the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wards parallel development, pursu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cus on human value, pursue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sol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problem of ethnic regions call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quires abandoning the western model, going beyond ethnic regions, synchronizing modernization with the whole country, and insisting on a unified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stitutes the realistic basis for solving the development problem due to the guarantee brought by the presence of our nation, the market demand brought by the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the efficiency release brought about by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space brought by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open space brought about by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Ethnic regions need to solve their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terms of five aspects: integrating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sisting on outcome equity, spatial justic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using digital and low-carbon technologies.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thnic regions; development problems

[责任编辑:罗萍]